

三味

夏商时期 考古文化

杨华◎著

科学出版社



三峡夏商时期考古文化

杨 华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三峡地区夏商时期考古资料为线索,结合相关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对三峡地区夏商时期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三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中,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而来的文化为本地区的主体文化,其遗存被认为是早期巴文化遗存,而北来的中原文化和西来的蜀文化,也在三峡地区汇聚交流。本书探讨了三峡地区夏商时期农业、饲养业、渔猎业、盐业、手工业等的发展情况,介绍了房屋建筑及丧葬习俗文化,并结合有关文献,从出土遗物、地层叠压关系、人骨资料等方面阐述了巴人起源于鄂西、三峡地区的观点,评述了巴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深入过程。此外,还开展了对三峡地区夏商时期长江洪水遗迹的研究,对三峡远古时期的长江河床的演变及河道走向进行了探索。本书是一部研究长江上游东部、长江中游西部地区夏商时期历史的重要著作。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水文学、水力学专家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峡夏商时期考古文化 / 杨华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03-041484-7

I. ①三… II. ①杨… III. ①三峡-夏文化(考古)-研究②三峡-商文化(考古学)-研究 IV. ①K872.7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1725号

责任编辑: 王光明 赵 越 / 责任校对: 郑金红

责任印制: 钱玉芬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8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4 1/4

字数: 800 000

定价: 20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考古学”资助项目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资助项目

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亚细亚流域文化研究所资助项目

重庆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献礼

序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随着三峡水利工程的建设，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三峡地区文物发掘与抢救工作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同时，许多古代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报告以及文献资料也在不断的公开，一些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也在出版和发表。这些考古发掘报告、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三峡古代社会文化以及自然和人类发展的互动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更进一步的探讨、研究三峡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并且使三峡社会与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渐向更加精细的、专门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它使我们对于三峡社会、历史以及人地关系有了更加清晰明确的认知，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三峡历史文化的研究向着深度与广度发展。杨华教授这部《三峡夏商时期考古文化》的新著即是这么一部主要通过考古发掘材料来研究三峡夏商时期社会发展和人地关系的专史类著作。

杨华教授潜心三峡新石器时代和先秦时期的考古、文化研究已有多年的历史，对于三峡这一时期的考古与历史文化有着长期的、较为深厚的积淀和心得。2005年我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峡考古新发现与多学科研究》时，曾经邀请杨华教授参加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研究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杨华教授撰写的学术著作《三峡远古时代考古文化》得到评审专家的赞誉和社会的认可，并由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纳入资助计划出版。这部著作于2007年出版后，受到了同行学者的重视和好评。但是杨华教授并没到此止步，而是在三峡地区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研究基础上拓展研究领域，对于三峡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文化亦继续进行深入探讨，经四载努力，写成这部80余万字的三峡夏商时期考古文化的学术专著。应该说，该书的写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杨华教授多年来对于三峡地区远古时代和先秦时期考古文化与民族、社会发展研究心得的展现。

正因为如此，该书可以说是颇具创意和新见的。该书既比较全面的对于三峡夏商时期的考古文化做了系统分析，同时也对于该时期三峡地区古代社会的发展及演变做出了颇有价值的复原和探讨，其中不乏精要之处。例如该书对于三峡区域夏商时期文化遗存进行介绍与研究时，从该地区西部和东部差异出发，通过对三峡西部夏商时期文化的典型遗址如忠县中坝、哨棚嘴、王家堡、瓦渣地、杜家院子，万州苏和坪、涪溪口、关木溪等遗址，以及三峡东部宜昌白庙、下岸，秭归官庄坪，长阳香炉石，秭归朝天嘴（第一期文化）等遗址的分析研究，探讨和分析三峡夏商时期东部和西部地区文化面貌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来说明三峡先秦时期考古文化内

涵的特征。应该说,这种比较分析与研究对我们认识三峡地区自古以来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个地区的特点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再如该书对三峡夏商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作者通过对大量考古资料的分析、研究表明,三峡东部地区的农业开发要早于西部地区,在这一地区,大约距今7000年以前就开始了种植水稻的历史。此后,这种稻作农业又沿着长江中上游流域逐渐的由东(东边早)向西(西边稍晚)发展,由此展现了史前稻作业的一些基本规律和三峡地区稻作农业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并且呈现了一种农业文明的雏形。该书还对于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夏商时期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纺织业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纺织业应该是早期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的呈现。书中正是通过对这一时期遗址中出土的纺轮观察从而发现,随着历史的发展,三峡各个遗址中纺轮数量越多,纺轮的种类也日渐丰富,各种纺轮,包括陶纺轮、石纺轮、骨纺轮、玉制纺轮等都开始出现。此外,这一时期用于缝纫的骨针、骨锥等也出现了,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城背溪文化遗存中出土的纺轮证明三峡地区的先民们至少在距今7000年以前就开始有纺织技术了,它表明三峡地区先民的纺织技术具有悠久历史,它对于我们了解三峡早期社会的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生活有着重要意义。

该书还对于三峡地区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讨和分析。例如关于三峡地区巴文化考古研究,这是对当时巴族历史的具有实证性的考古学分析。作者依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在分析与探讨中进一步论证了三峡地区夏商时期巴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早期巴文化的联系,认为鄂西、三峡地区这些被称为“早期巴文化遗存”的日常生活用具绝大多数都是由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的器物直接发展而来的,因此在鄂西、三峡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中,应当更多的是“早期巴人遗存”,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应该是由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三峡地区早期的巴人活动情况,了解巴族与当时土著在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上的联系十分重要。

我认为该书富有特点和新意之处还在于对三峡夏商时期长江洪水遗迹与周期、长江河床及河道变化及走向的考古研究。这是杨华教授长期潜心研究的一个学术方向,也是当前三峡库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上三峡地区长江洪水遗迹与周期规律是我们了解三峡沿岸人类活动与自然条件互动的基础。越是在人类活动的早期,当人们对自然界的征服力量相对弱小的时候,自然条件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就越大,有的甚至直接关系到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的发展方向。但是,由于过去文献记载的阙如,包括长江沿岸历史上各类题刻中对于先秦三峡洪水史料记载的稀少和模糊,它使我们无法更为清晰地了解先秦长江中上游洪水泛滥程度和洪水周期、长江河床及河道变化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事情。但是在该书中,作者却对于这个重要问题给予了很好的探讨与分析。据我所知,杨华教授和其课题组成员曾经对三峡地区远古时期即距今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发生洪水的历史进行了

长期的探讨、研究，通过新的方法的应用，主要是通过对三峡发掘遗址地层资料中的洪水“淤沙层”分析，根据各个遗址堆积层中的“淤沙层”的沉积关系，以及各遗址“淤沙层”之上、下堆积层中出土遗迹和遗物的年代，结合 ^{14}C 测定的年代数据进行分析，以及遗址所在地的海拔，由此较为准确地推测出长江洪水发生的年代及长江发生洪水的海拔。这种长期的研究工作是该书能够较好的解释三峡远古时代长江洪水遗迹，长江洪、枯水时的海拔、周期的认识的基础。正是通过这种实证性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三峡远古时期长江河床演变的历史，知道当时长江河床及河道三峡段的变化途径及走向，进一步了解这一地区长江河床、河道由低（深）变高（浅）、由窄变宽的历程。这既深化了我们对于历史上长江水文和周期、三峡沿岸人地关系历史的理性认知，也对于我们今天进行三峡地区长江河道的治理，合理开发长江中上游流域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这个意义来说，该书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这部著作通过对大量三峡地区至目前所发掘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的考辨，基本理清了三峡夏商时期各种考古文化的发展序列，由此阐明了这一地域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使研究者通过此书能够方便、全面了解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它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与四川盆地、江汉平原等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勾勒整个长江中上游地区先秦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均有着重要意义。所以该著作的出版对于三峡先秦时期的文化、民族、社会的研究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也殷切希望作者在今后能够出版、发表更多这样的论著，以深化对三峡历史、文化及社会发展的研究。

李禹阶

2013年10月于重庆师范大学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前言

大规模的三峡考古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好几年了，除少数古文化遗迹如一些古墓或时代较晚（东周以后）的遗址未及发掘外，大部分都得以发掘且发掘报告都已陆续公布。据粗略统计，已陆续公布或出版的大型综合性考古报告集、遗址及墓葬发掘报告、学术文集、考古研究专著等，已达50余本。毫无疑问，这些已公布的资料为我们深入研究三峡地区夏商时期考古文化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第一手资料。而这些资料，不仅汗牛充栋，且多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发现，因此，对这些资料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一种责任，尤其对我们这些身在重庆、湖北两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更难免有一种清理出其中完整脉络的冲动。尽管我们面对的研究任务庞杂、艰巨，但我们在面对以上资料时，虽有惶恐但更有一份兴奋。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用一份辛劳来履行这份研究义务并完成这份研究使命。

笔者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奔走于鄂西、三峡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为配合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笔者参加并主持了湖北省几个县的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20世纪90年代，笔者又转入到更大规模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而引发的三峡库区文物考古发掘工作中，参加了湖北、重庆部分市、县的文物调查和考古研究工作，收集了大量三峡地区田野考古的第一手资料和一些历史、民族、地方史志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因此，除日常工作之外，笔者基本上将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对三峡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之中，并发表了近200篇关于三峡地区历史、考古、民族、民俗、地方史志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在最近的10年里，面对丰富的三峡地区考古资料，笔者萌发了将三峡地区考古文化遗存尽可能按时代发展序列编写成书的想法。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课题，它的确定成了对笔者的一种鞭策和鼓励，迫使笔者不得不朝这一目标去奋斗，去努力。

2005年，笔者参加了由重庆师范大学李禹阶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峡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研究》的工作，笔者在其中承担了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子项目。2007年，这一子项目的研究任务得以完成，其相关著作定名为《三峡远古时代考古文化》，由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纳入第十一批资助计划之列，于2007年9月出版。这部著作出版后，受到了业内学者们的重视，《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第494页登载了该书的内容摘要。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高崇文教授在为该专著所写的推荐出版意见中评价说，该书“①资料齐全。将三峡地区至目前所发掘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基本全部收齐，使研究者通

过此书能够很方便地全面了解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②重点突出。该书将各时段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遗址进行了重点分析，深刻揭示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特征；③理清了各种考古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编年体系。三峡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阐明了这一地域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④深入研究了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与四川盆地、江汉平原等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勾勒出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远古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⑤利用考古资料，对当时社会发展、人类居住环境及自然环境的变迁等进行了多学科探讨，为三峡地区水利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也可提供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吴耀利研究员也在推荐出版意见中提出了与高崇文教授大致相同的意见，吴教授指出：“（三峡地区）这些丰富的考古资料，对于研究三峡地区古代文化、社会发展乃至自然环境等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全面系统报道和研究三峡地区古代文化的考古学著作，杨华同志撰写的《三峡远古时代考古文化》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白。”不过，笔者需要在此指出，这部被二位先生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著作，却仅仅只是对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其后续的夏商时期考古文化，春秋、战国时期考古文化，以及秦汉、魏晋南北朝及以后时期的考古文化等，还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基于此，笔者不禁考虑按各个历史时期将三峡地区考古文化情况一一写出，尽可能地从考古发现资料来复原三峡地区古代社会的发展历史，让广大读者沿着这一历史脉络去了解三峡地区的古代社会演变历程。笔者也同时希望，以这样的一种规模性研究为契机，寄望于吸引更多的同行学者来共同研究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从而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思路的驱使下，笔者于2008年向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递交了《三峡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基金项目的申请并获得批准。历经四年多的辛勤劳作，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已按预期顺利完成。《三峡夏商时期考古文化》在内容上较此前的《三峡远古时代考古文化》更丰富、更全面，其中的章数和节数也有所增加，有些涉及石器时代的内容，是《三峡远古时代考古文化》中所没有述及的，在收集整理既有资料后，笔者对这些内容在这本《三峡夏商时期考古文化》中进行了补充，从而弥补了前部著作的不足。为了便于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正文之前能从宏观上了解本书的内容，笔者在此将各章节中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果做以下概述。

第一章，绪论。

共分五节。本章对三峡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作了概述。笔者在本章中陈述，三峡地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三峡地区指旧时所指的西自重庆奉节白帝城而东至湖北宜昌西陵峡出口的一段峡谷，而广义的三峡地区则基本上包括了湖北宜昌和重庆市的绝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区域里，根据其自然地理环境和古文化遗存的内涵，又将其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地理单元，在这两个地理单元里，远古直至近现代的人类，一般多选择长江及其支流的沿岸山前阶地和缓坡作为活动地。考古发现的夏商时期人类

居住遗址，一般就都分布在这些山前阶地和缓坡上。

这些夏商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都是1949年以后逐渐发现的，从刚开始的调查发现到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考古调查和零星的小规模试掘，有一些夏商时期的遗物被发现，但缺乏认识；第二阶段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是配合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对西陵峡地区（湖北地段）长江及支流沿岸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批夏商时期的文化遗物和遗迹。其文化性质主要是巴文化，另外也有同时期的北方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长江上游川西地区文化因素的陶器；第三阶段在20世纪九十年代及21世纪初，为配合长江三峡大坝水利工程建设，考古部门对整个长江三峡地区即海拔175米以下的近千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其中属于夏商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有近200处。其文化性质：三峡东部地区以“白庙文化”“朝天嘴文化”“路家河文化”遗存为代表；三峡西部地区以“中坝文化”“石地坝文化”“中坝子文化”遗存为代表。从新石器时代到商时期末，文化发展序列清楚，中间没有缺环。本书将从各个方面揭示三峡地区先民们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研究和复原三峡地区古代社会的发展及演变提供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参考史料。

第二章和第三章，夏商时期考古文化资料。

在这两章中，我们对三峡西部和东部区域里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进行了全面介绍，并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处遗址进行了详细说明。此二章显示，在遗址分布的密集程度方面，三峡东部似要比三峡西部地区相对密集，尤其在西陵峡地区的宽谷地带，夏商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几乎一处连着一处，这表明在夏商时期，此地曾生活着较多的人群。经对整个三峡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资料的比较，尽管其东部和西部地区总的文化面貌相似，但差异也是明显的。

三峡西部地区夏时期文化遗存主要以忠县中坝、哨棚嘴、王家堡、瓦渣地、杜家院子，万州苏和坪、涪溪口、关木溪，奉节老官庙，巫山魏家梁子等遗址为代表，被考古学研究者命名为“中坝文化”^①。中坝文化的分布范围东边已达到巫山地区，西边至江津地区，另西北边的嘉陵江下游、渝东南地区的乌江中下游地区，也都有发现。器类比较简单，以缸、深腹罐数量最多。中坝文化可分为四期，时代包括早期、中期、晚期，年代在距今4600~3700年。

三峡东部地区夏时期文化遗存主要以宜昌白庙、下岸，秭归官庄坪，长阳香炉石等遗址，秭归朝天嘴（第一期文化）等遗址为代表，分别被考古学研究者命名为“白

① 孙智彬：《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初论》，《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孙智彬：《渝东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8期，2005年，第15~26页；另奉节老关庙、巫山魏家梁子遗址中同时也出土有较多的“白庙文化”因素的陶器，因此，也有考古研究者认为是白庙文化的遗存。

庙文化”^①“朝天嘴文化”^②。这类夏时期文化遗存主要以长江西陵峡为中心区，另在东边的汉江平原西部，西边的巫峡地区，以及南边的清江流域都有发现。器类多为平底器、圈足器和圜底器。罐、釜类遗物在夏时期遗存中是最富有特色的器物，其总数在遗址中一般占半数以上^③。从考古发现陶器形态学的比较分析，再结合¹⁴C测定年代数据综合起来看，白庙文化遗存的年代相当于夏时期早期、中期和晚期。

三峡西部地区商时期早期遗存主要以涪陵蔺市，忠县老鸪冲、中坝，万州中坝子、塘房坪、黄柏溪、王家沱、巴豆林，云阳伍家湾等遗址为代表，被考古学研究者命名为“中坝子文化”^④。中坝子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三峡西部的重庆地区，并以忠县、万州、云阳为中心。器类主要有平底器、圈足器、尖底器和三足器，罐类数量相对最多，占陶器总数的60%以上。中坝子文化可分为三期，分别与三峡东部地区的秭归朝天嘴文化遗存的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年代相当。三峡西部地区商时期晚期遗存主要以丰都石地坝、涪陵镇安、忠县邓家沱、万州涪溪口等遗址为代表，被考古学研究者命名为“石地坝文化”^⑤。该遗存主要以重庆市的涪陵、丰都、忠县、万州等长江沿岸的地点为中心，另在渝东南的乌江中下游、渝西北的嘉陵江中下游地区也有发现。器类主要有尖底器、圜底器、平底器等。石地坝文化遗存可分为四期：年代分别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偏晚至殷墟一期、殷墟二期、殷墟三期、殷墟四期及西周早期^⑥。

三峡东部地区商时期早期遗存主要以秭归朝天嘴、何光嘴、宜昌中堡岛、宜都红花套、长阳南岸坪等遗址为代表，被考古学研究者命名为“朝天嘴文化”^⑦。朝天嘴文

-
- ① 卢德佩：《鄂西发现的古文化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1986年宜昌白庙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
- ② 于孟洲：《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余西云：《巴史——以三峡考古为证》，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江考古》（第7层共出土陶器88件，其中罐、釜就有50件），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 ④ 余西云：《巴史——以三峡考古为证》，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于孟洲：《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 ⑤ 白九江、李大地：《试论石地坝文化》，《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重庆出版社，2007；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重庆文物考古十年》，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 ⑥ 重庆文物考古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石地坝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 ⑦ 林春：《长江西陵峡远古文化初探》，《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8～41页；于孟洲：《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化的分布范围主要以西陵峡长江沿岸为中心区，另在东边的江汉平原西部、南边的清江中下游、往西的巫山地区，都发现有朝天嘴文化因素的陶器。朝天嘴文化遗存可分为四期，年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至商时期晚期（偏早阶段）。该遗存中的出土陶器可分为五组：A组有来自于四川盆地的蜀文化因素；B为土著文化；C组有来源于北方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D组受到了该地区先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影响；E组则有来源于三峡西部地区的中坝子文化因素。

三峡东部商时期晚期文化遗存主要以宜昌路家河、中堡岛、杨家嘴，秭归长府沱、渡口等遗址为代表，被考古学研究者命名为“路家河文化”^①。路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与朝天嘴的文化分布范围相似，但对北边汉水流域的汉中地区影响强烈。路家河文化陶器分为四组：A组来源于本地区先前的朝天嘴文化；B组器物受到植根于四川盆地的蜀文化（成都十二桥文化）因素的影响；C组来源于北方中原商文化的因素；D组有来源于三峡西部石地坝文化的因素；E组则与长江下游地区同时期文化联系密切。路家河文化遗存陶器可分为三期，年代分别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里冈上层、殷墟前期^②。

这一时期的陶器文化，东部地区是以釜、罐等为主要特征的土著文化，而西部地区则似与成都地区的广汉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四章，社会经济、技术（包括农业、畜牧业、渔业、狩猎、盐业、青铜器铸造业、骨器、纺织业、窖业等）。

考古发现资料表明，三峡东部地区的农业开发要早于三峡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早在距今7000年以前就开始有了种植水稻的历史。从整个长江流域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来看，是一个由东（东边早）向西（西边稍晚）发展的趋势。我国西南地区的稻作文化可能是由长江中游地区的稻作文化传播而去的。至夏商时期，饲养业有了发展，主要畜禽有牛、猪、犬、羊、鸡等。而大量鱼骨、兽骨的发现，说明渔猎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时，这里的盐业技术发达，是当时中国产盐最早的地区。青铜器在此亦有较多发现，但多是一些小件，技术落后。出土的骨器主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和装饰品，以及一些用于祭祀的卜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城背溪文化遗存中，还出土了一些陶纺轮，证明三峡地区的先民们至少在距今7000年以前就开始有了纺织技术。除纺织技术外，窑业技术也已臻成熟，其中以升焰窑居多，次为半倒焰窑，然后是龙窑。龙窑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而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夏商时期期间各个历史时期遗址中出土的纺轮数量来看，则是历史越往后发展，纺轮数量也就越多。不仅如此，纺轮的种类也丰富了，包括有陶纺轮、石纺轮、骨纺轮、玉制纺轮等。此外，与纺轮伴出的还有用于缝纫的骨针、

①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② 林春：《路家河文化简论》，《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骨锥等。这些直接用于纺织业生产工具的出土，表明三峡地区先民的纺织业技术具有悠久历史，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城背溪文化遗存中出土的纺轮，证明三峡地区的先民们至少在距今7000年以前就开始有纺织技术了。

第五章，房屋建筑与埋葬习俗。

夏商时期及其以前，房屋建筑形式最常见者为“地面台式建筑”，其次为悬空或半悬空的“干栏式建筑”，再次为“半地穴式建筑”。房屋平面形状见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等。以前者（长方形）居多，后者少量。房屋遗址除大多数为单间外，另发现有成片的多座房屋，其中还有多室的三间组合为一体的房屋。这种多室房屋的功能包括有休息室、烹饪室和寝室。房屋面积方面，其单间房屋的面积多在10~30平方米，多间（三间）房屋的面积则可达100平方米以上^①。房主的身份和地位可从房屋的状况窥见一斑，享受多间且面积较大房屋的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当非比寻常。

墓葬主要有土坑墓、崖墓、瓮棺墓等，皆为小型墓葬。在有的居住地，也发现有集中埋葬的公共墓地。墓葬的埋葬方向大多一致，这种埋葬习俗反映出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某些现象。此外，在对部分人骨体质特征进行分析之后，获得了此地夏商时期居民是由新石器时代居民延续而来的研究结果。这一时期的墓葬，其形制和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皆与先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哨棚嘴三期文化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数量情况差不多，形制大致一样，随葬品数量一般也只有几件，而像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溪文化时期）墓葬中那样放置随葬品十多件、数十件甚至多达五十余件的现象，几乎没有。

第六章，三峡地区巴文化考古研究。

先秦文献记载：“西南有巴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又商代殷墟甲骨文中，多有“巴”方的记载，甲骨卜辞中还记载了商王武丁时期曾多次南下征伐巴方的情况。这一章节重点讨论了三峡地区夏商时期巴文化遗存反映的史实，印证了夏时期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的历史情况。

据考古发现研究，鄂西、三峡地区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应是“早期巴人遗存”，而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是由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于是，考古学研究者对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包括中期和早期）、夏商时期文化遗址和遗物从两个方面去进行了比较分析。首先是考古“地层学”的叠压关系，考古发现资料反映，鄂西、三峡地区的一些夏商时期巴人遗址，其堆积层之下多叠压着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甚至还叠压有更早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其次是考古“类型学”

①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何光嘴》，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24页。

的比较,在鄂西、三峡地区夏商时期巴人遗址中,出土了大批富有特色的陶器,这些陶器都为日常生活用具,主要器类有圜底器、圈足器、三足器、平底器、尖底器等。经类型学比较获知,鄂西、三峡地区这些被称为“早期巴文化遗存”的日常生活用具,绝大多数都是由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的器物直接发展而来的。在科技考古方面,科技工作者通过对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商时期陶器的制作原料进行的技术检测分析发现,商时期陶器所用原料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所用原料的成分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根本就是相同的,这表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在比较分析三峡地区夏商时期巴人遗址、遗物时,研究者可明显看到巴文化在发展中不断地受到周邻地区其他文化的影响,其中主要是来自北方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和四川盆地蜀文化的影响,也有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影响。我们甚至还发现,在有些遗址中,其文化面貌曾在一段时间里表现为外来文化因素几乎占据主要地位的情形。但尽管如此,在整体文化面貌方面,先秦时期的巴文化在鄂西、三峡地区仍然有其清晰的自身发展面貌,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该地区的传统文化一直贯穿于古代巴人生活的始终。

据文献史籍记载,远古时期的巴人与当时活动在长江中游地区的三苗民族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苗民族有着巴族文化的因素,或者巴人本身即应属三苗民族。巴人对清江的开发,其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夏商时期或新石器时代末期,其开发路线是由清江下游逐渐向上游拓展的。其后巴人在清江中游地区的长阳渔峡口一带,建夷城而定居。考古发掘的香炉石遗址,可能与当年廪君巴人开发清江的历史有一定关系。

巴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距今已历80余年。而巴文化最先的研究,却是从“巴蜀文化”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鄂西和三峡地区堆积如山的出土文物资料表现出与四川地区先秦文化遗存的一定差异,不得不使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逐渐从过去笼统称谓的“巴蜀文化”旧概念中将“巴文化”分离出来,从而复原出它的本来面目。回顾巴文化研究的八十余年历程,可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30~1949年);第二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1950~1979年);第三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1980~2010年)。第三阶段是巴文化学术研究活动的高峰期。

第七章, 三峡地区夏商时期长江洪水遗迹的考古研究。

1949年后,水文和文物部门先后对三峡地区洪水遗存及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进行10次大规模调查。搜集到了大量有关长江水文的历史文献和题刻,对三峡地区最早自公元前185年(西汉高后三年)以来至1949年前后长达2100余年时间里的各类文献和题刻资料进行了整理,发现有关洪水的题刻和历史文献记载线索近4000条。这些有关洪水的题刻和文献史料,为我们研究三峡地区古代洪水和洪灾的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然而,在这数千条有关洪水的题刻和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先秦时期的资料却

很少。各类文献史籍及地方史志中虽说有过一些依据历史传说而语焉不详的记录，如“禹开山治水”“及禹治水”“禹凿通江”“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也”“杜宇所凿巫通水”等，显然都过于笼统。正是因为各类题刻中或无先秦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洪水的史料记载线索，或历史文献虽有记载却又过于笼统，模糊不清，这就使我们无法了解先秦时期长江发生洪水的历史事件。那么，怎样才能了解先秦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曾经发生过洪水的历史呢？

近年来，本课题对三峡地区远古时期即距今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发生洪水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成果已在2007年出版的《三峡远古时代考古文化》一书中刊出，使广大读者了解到了有关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长江洪水遗迹的情况，并对远古时期三峡地区长江洪、枯水时的海拔获取了一定认识。探索三峡地区远古时期长江洪水遗迹，本书的课题组采取的方法是，选择考古人员在三峡地区发掘并已公布的部分遗址地层资料进行分析，一般而言，长江大洪水发生后，往往会在地层堆积中形成一层“淤沙层”，有的遗址堆积层中还会有几层这样的“淤沙层”。依据各遗址堆积层中洪水“淤沙层”之上、下堆积层中出土遗迹和遗物的年代，尤其结合某些遗址中¹⁴C测定的年代数据，我们就会较准确地推测出当时长江洪水发生的年代，又根据遗址所在地的海拔，推测出当时长江发生洪水的海拔。

本章中有关三峡地区夏商时期长江洪水遗迹的讨论，我们同样采用以夏商时期遗址地层中洪水淤沙层之上、下文化堆积中遗物的时代来判断三峡地区远古时期长江洪水发生的年代，同时以洪水淤沙层所在位置的海拔来推测当年长江发生洪水的海拔。这种以考古发现资料来揭示夏商时期长江洪水遗迹现象的研究，是一种考古发现与相关学科相结合的尝试，其研究方法有一定科学意义。

第八章，三峡地区远古时期长江河床演变历史研究。

文理学科的研究者虽曾对三峡地区远古时期的长江河床演变历史屡有论及，但多偏重于第三纪、第四纪（更新世以前）或近现代。而这里所指的远古时代，是指距今约15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其年代跨度长。探索这一时期长江三峡地区古河床演变的历史，无疑是很棘手的研究课题。据三峡地区考古发现资料，一些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人类居住遗址，一般都分布在三峡地区长江及支流沿岸的阶地上，其遗址所处位置海拔一般并不一样，有的稍高，有的稍低，由于这些遗址多分布在长江及其支流的沿岸阶地上，且年代久远，故受到自然及人为的破坏非常严重，到发掘时，除少数遗址保存相对较完好外，绝大多数遗址都曾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的遗址仅存遗物，而无原生堆积，更有一些遗址只有到冬季枯水期时才能暴露在长江河床上，而每值长江洪水期时则又被江水淹没。然而即便如此，这些沿江分布的远古人类居住遗址依然为我们研究三峡地区远古时期长江河床演变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本章以考古学为基点，从古人类居址的海拔出发，结合地貌史学，对三峡地区自

新石器时代以来长江河床的演变历史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三峡地区的长江河床及河道，是逐渐由低（深）变高（浅）、由窄变宽的。从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居住遗址资料来考察三峡地区长江河床的变迁历史，这或许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填补了过去无人进行此类研究的空白，也为当今合理开发和治理长江提供了科学依据。

虽然，在经过了几年的努力之后，我们完成了《三峡远古时代考古文化》和《三峡夏商时期考古文化》两部著作，但这仅仅只是全部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续后的研究任务还相当繁重。而且，在这两部已经完成的著作中，也不可能囊括整个三峡地区远古时代和夏商时期的全部考古文化资料，涉及其他学科领域的各个方面，亦难以一一得以反映。而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资料如此浩繁，其研究非单一学科及个人力量所能完成，若求面面俱到，则更非一人之力所能及。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多学科领域全方位来展开对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因此笔者殷切期盼能有更多的研究者为此项研究活动献出智慧和辛劳。我们相信，若有各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参与并从各方面来细化这些考古学资料，那么，在此项研究活动中，我们或许会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新成果，从而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全面，更加系统，也使我们期待的成果更加丰富，更加圆满。